

忆

2012年10月19日 星期五

第41期

忆

2012年10月19日 星期五

第41期

忆

2012年10月19日 星期五

第41期

时下有“仇官”、“仇富”之说，笔者以为这都是些伪命题，且有转移社会焦点和“抹黑”普罗大众之嫌。老百姓“仇官”主要是仇贪，他们仇过像谷文昌那样的官吗？“仇富”主要是仇掠夺，民众仇过像姚明那样的富吗？但是，时下有一种“仇富”却被“忽略”了，那就是权力仇富，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权力夺富。

权力夺富的前提，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大行其道，在皇权社会，遍布这样的前提，故权力夺富在封建社会屡见不鲜。汉桓帝时期，外戚权臣梁冀独霸朝纲，权力使他富甲天下但仍贪得无厌，于是，他发动了一场“黑打”运动，派出亲信分别到管辖的各县，调查登记当地的富人及其财产，然后冠以罪名将这些富人下狱，严刑拷打让他们用钱顶罪。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将洛阳城中的富豪全部逮捕，然后安个罪名诛之，没收其财物，死者不可胜数。类似的事，历代不绝，今天仍不鲜见。2011年10月财新网在京召开了“公权力与民营企业财产权利保护”的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个别官员凭借手中权力，肆意掠夺民营企业财产，甚至对其罗织罪名，施以酷刑，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

权力夺富可分两种，一种是明火执仗。比如朱元璋夺

权力夺富最可怕

沈万三之巨富，西晋孙秀发石崇之横财，以及梁冀、董卓的行为等等。

由于权力的不可抗拒性和其本身所裹挟的巨大暴力，因此，它有着雷霆万钧之力。不管多大的老板，多雄厚的财富，权力所指，一夜之间就会使其家破人亡、灰飞烟灭。另一种是暗中运作。比如今天山西繁峙县的反贪局长穆新成，个人资产就达2亿多。巨额财富靠“以办案为名的敲诈”，迫使老板“进贡”消灭而来。这“办案”就是“曲径通幽”，这就是一块“遮羞布”，背后仍是权力的威力。

若这个社会权力大于法，那么权力是石头，富豪是鸡蛋；权力如老虎，老板似兔子。然而，不管这种夺富多么荒唐，权力都会打着“依法”的旗号。卓劣如董卓者，都懂得这一点，何况今日的部分“聪明人”。

古今中外，那些靠劳动和智慧发财的富豪，多是精明的企业家和商人。他们及其企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李富的结果会对社会造成重大伤害和灾难。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几乎从经济上消灭了所有的富人，也消灭了民营企业，甚至补锅、卖烧饼的也进入了“大集体”。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没有使老百姓走向富裕，反而驶向了全民贫穷。

（摘自《清风》2012年第8期 刘吉同/文）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感觉与10年前相比，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

对于陌生人社会，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有过一段经典阐述：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陌生人建筑我们的房子；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时，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

我们总是仰仗陌生人的仁慈

果我们得病住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不管你是谁，我总仰仗着陌生人的仁慈。”这句话在美国红了30年。然而，30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国人，骤然被置于此，有着强烈的心理焦灼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一方面跟网上的陌生人说心里话，而和最最近的同事保持距离。因而，“当国外盛谈中国要不要拯救欧洲之时，中国的老人倒了却没人扶；有人在家挖地窖关“性奴”时，单位领导、片警、邻居却不知道……”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纠结。陌生人社会没有真正到来，信任空白成为社会转型的阵痛，并且还在持续，大多数民众还缺乏现代意识、公共意识。

接纳陌生人，是一种向善的力量，社会信任体系的重建将从对陌生人释放的善意上开始萌发。风靡世界“抱抱团”运动，虽然有些造作，但已显露了这种征兆——对“陌生人”的接纳，是一种更高的文明尺度。

（摘自《三月风》冯欢/文）

近日，有两则关于路桥收费取消后出现相似管理情状的报道，值得放在一起关注。

从10月8日开始，收了26年过桥费的郑州黄河公路大桥不再收费了。然而，大桥免费通行之后，原来的各项管理措施也一夜之间没了踪影，本该绕行的三轴以上货车甚至超重、超限车辆在桥上一律畅通无阻。

宁夏吴忠黄河大桥辅道桥在今年7月撤销了存在10年的收费站，正当当地民众拍手称快的时候，当地政府部门却在路口设置了路障，通车道变成了死路。宁夏公路管理局日前称，封路是出于安全考虑。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和吴忠黄河大桥辅道桥取消长期的收费，让公路回归公益性，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取消收费的同时，应有的管理责任也一并取消，前者的管理部门忽视超重、超限车辆对桥梁带来的安全隐患，而后者干脆以封路不用省却管理责

今天看到的德国年轻人，他们是充满自信的。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

在德国柏林，有一个本德勒建筑群。它是著名的第三帝国建筑。在二战期间，这里是德军司令部。现在，楼上是一个信息密集的永久性展馆，主题是德国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它收集了许许多多的人物故事，有反抗纳粹的犹太人；有大量协助犹太人躲藏和逃离的普通德国人，其中就有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有宗教界、文化界人士的反抗；有自发的抵抗运动小团体，还有体制内的、甚至军界的抵抗。

展览馆之所以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展馆的一个房间，曾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斯陶芬伯格的办公室。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被逮捕，就从这个楼梯被带下去，就在下面的院子里，与他共谋的另外三名军官一起，被枪杀。就在他们就义的地方，今天站立着石雕全身像：一个裸体的、双手在身前被捆绑的、沉稳的人。站在他面前，读过这段历史的外人，都难以无动于衷，更不要说那些德国年轻人了。

这个展馆到处都有放在墙边、角落的凳子，是给德国学生来这里上历史课用的。这里展示的是他们的英雄。参观的学生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汉斯·萧和索菲亚·萧兄妹二人发起的白玫瑰抵抗小组，他们和一批同龄人、他们的教授，最后都被纳粹处以绞刑。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

2005年，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建立起一万九千平方米的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在那里，也随时可以看到一群群中学生在上历史课。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更是普世的。

我想起中国人也常常提及国民性，因为我们有过文革这样的疯狂。可是在疯狂中，也有无数对疯狂的抵抗者。假如我们回避自己历史中的黑暗和罪恶，假如我们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不提及我们黑暗年代中的那些英雄、不确认他们和普世价值同构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可能是混乱的，我们的民族自信也很可能是虚妄的。

（摘自《新京报》9.29 林达/文）

任，辅道桥收费之时难道就没有安全风险？

路桥收费的取消，意味着当地政府放弃一笔可观的财政收益，但放弃收益并不意味着也放弃公共管理责任。政府担当的公共责任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履行的。没有经济利益就不履行管理责任，政府无异于企业，只做对自己有收益的事。

在现实中，不少政府部门有时是无收益则无管理、无责任，有时是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对责任的承担不够，而有收益的事都争着去做。比如，很多管理事项都缺少了收费，但一些事项实际管理并不多，问题没解决多少，精力可能放在收费上去了，结果管理就是收费；而一些时候，政府部门为了收费，甚至额外设立管理事项，任意扩大权限，为收费而“管理”。让经济利益主宰公共管理，不仅让公共管理丧失本来面目，也让政府失去本义。

（摘自《长江日报》10.15 李建华/文）

抵抗疯狂的英雄

15

今天，中国的股市发展如火如荼，但是发生在22年前、国庆40周年前夕的“中南海里购股票”风波事件，我（当时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信息处工作）作为此事的见证人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挺有意思。

198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是《中南海里购股票》。报道总共不到300字，介绍了“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汇集了很多，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买过的东西——股票……”

当日早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广播了这一消息，没想到这条消息炸了锅。当日上午9点，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立即问国务院办公厅：“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了？”特别敏感的外国通讯记者也广泛报道。许多股份公司的人打电话问我，他们能不能也到中南海发股票？

此事的背景和缘由是：1988年7月，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咨询国家体改委的有关领导“可否到北京发金杯股票”？国家体改委的有关领导也没有明确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但当时给金杯公司的感觉是可以试试。

于是金杯公司开始了投石问路，我目睹并参与了金杯股票的发行全过程。

1988年9月8日中午，我帮助金杯公司的发行人把该公司的招股章程贴到了国家体改委机关办公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食堂门口，告知大家今天下午2点发行金杯股票。

当时金杯公司派来两位同志，我们3人就在国家体改委机关办公楼的过道大厅处摆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开始工作。我们在发行桌前整整呆了一下午，应该说，发行工作不理想。其原因：一是许多机关干部都不懂股票，二是当时人们手中余钱都是少得可怜。我记得我当时银行存款不足1000元，要拿出100元买一张前途莫测的“纸”，还真得掂量掂量啊。但总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大约1980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4周年，我们在《人民日报》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诗《假如他还活着》：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但他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但决不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谁料得，没有多久，麻烦就来了。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先是查询此诗有什么背景？作者是谁？我们当即据实报告：作者

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诗是他自己寄来的，不是报纸约稿，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说有什么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

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仅此而已。

但是，麻烦并未结束。追查者继续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写？作者的矛头针对谁？影射谁？我们答：看不出他的“矛头针对谁”，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谁”。质问者就指出：现在谁能在出外时“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吗？刊登这么一首诗，是什么居心？什么用意？据传达者说，已经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了。

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了。我作为报纸文艺部负责人，自然责无旁贷，立即承担一切责任。于是先向报社领导详细说明其实很简单的经过，他们当然也明白，问题哪有那么严重？但是上面既然追查，不能不向我传达，也不能不有个交代。我就按惯例用个人名义给这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由于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编辑工作中有疏忽，使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当可能引起读者误解的诗见了报，会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今后一定更加注意云云。我将信寄出后，并未惴惴不安，因为我有经验，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结束，不会有继续追查作者和责任编辑之事发生，毕竟是十年动乱之后，不大可能再如过去那样以文贾祸了。

果然，再无下文。

（摘自《风云创刊：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 /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那诗

我在中南海推销原始股

国家体改委的有关领导“可否到北京发金杯股票”？国家体改委的有关领导也没有明确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但当时给金杯公司的感觉是可以试试。

于是金杯公司开始了投石问路，我目睹并参与了金杯股票的发行全过程。

1988年9月8日中午，我帮助金杯公司的发行人把该公司的招股章程贴到了国家体改委机关办公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食堂门口，告知大家今天下午2点发行金杯股票。

当时金杯公司派来两位同志，我们3人就在国家体改委机关办公楼的过道大厅处摆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开始工作。我们在发行桌前整整呆了一下午，应该说，发行工作不理想。其原因：一是许多机关干部都不懂股票，二是当时人们手中余钱都是少得可怜。我记得我当时银行存款不足1000元，要拿出100元买一张前途莫测的“纸”，还真得掂量掂量啊。

但总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大约1980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4周年，我们在《人民日报》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诗《假如他还活着》：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但他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但决不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谁料得，没有多久，麻烦就来了。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先是查询此诗有什么背景？作者是谁？我们当即据实报告：作者

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诗是他自己寄来的，不是报纸约稿，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说有什么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

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仅此而已。

但是，麻烦并未结束。追查者继续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写？作者的矛头针对谁？影射谁？我们答：看不出他的“矛头针对谁”，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谁”。质问者就指出：现在谁能在出外时“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吗？刊登这么一首诗，是什么居心？什么用意？据传达者说，已经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了。

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了。我作为报纸文艺部负责人，自然责无旁贷，立即承担一切责任。于是先向报社领导详细说明其实很简单的经过，他们当然也明白，问题哪有那么严重？但是上面既然追查，不能不向我传达，也不能不有个交代。我就按惯例用个人名义给这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由于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编辑工作中有疏忽，使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当可能引起读者误解的诗见了报，会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今后一定更加注意云云。我将信寄出后，并未惴惴不安，因为我有经验，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结束，不会有继续追查作者和责任编辑之事发生，毕竟是十年动乱之后，不大可能再如过去那样以文贾祸了。

果然，再无下文。

（摘自《风云创刊：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 /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下午2点40分，国家体改委经管司的一位干部率先打破僵局，买了一股（每股100元），算是开了盘。接着，经管司的其他一些人也买了几股。

当时他们买股票，绝对没有任何想发财的目的。从小的方面讲，纯粹是为了改变金杯发股票冷场的尴尬局面；从大道理讲，是支持股份制发展，用自己有限的资金支援企业建设，其行动非常可贵。

一直到4点左右，发行工作马上就要结束时，奇迹出现了。

此时来了一位姓柴的小伙子，从包里拿出一万元现金，二话不说买下了100股。我当时真没见过那么多钱，看得我都眼晕。我问小伙子：“你干嘛买这么多股票？”他答：“我准备出国了，这些钱留着也没用，干脆买股票吧！”我说：“你知道股票是有风险的吗？”他答：“有风险就有吧，再说，招股书上不是写明每年有16.5%的利息吗？”

我又进一步和他攀谈得知，他本人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他父亲是国

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干部。他是听他父亲说院里正在卖股票（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在一个院内办公）。就是这样，整个发行工作基本上是在冷冷清清中收盘了。但这个不起眼的发行事件后来掀起了一个挺大的动静，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南海里购股票》的报道风波。

《中南海里购股票》的报道刊出后，有关领导也找我询问此事的来龙去脉。我如实汇报。为澄清这一事实，我又赶紧写了一篇报道，指明了是“在北京西安门大街某国家机关大院内进行了试发售……”，从而澄清外界的误解。

9月15日，《人民日报》也发出重要更正，指出“9月11日本报一版刊登的《中南海里购股票》一文，是一篇完全失实的报道……”

至此，这炸了锅的风波才趋于平静。（摘自《文史博览》李樟陆 / 文）

那事

军售新闻背后的外交智斗

中方求证，“苦果”究竟有什么含义。面对中方的强大压力，法国最高层权衡利弊，最终做出了停止这笔交易谈判的决定。法国外长1990年1月6日约见我驻法大使，称“法国最高当局领导决定，法国将不再继续与台湾作军舰生意”。但是，这样一个私下口头承诺对中国方面是不够的，一个公开正式答复才有可信度，才符合外交原则。但法方始终不愿就此作公开的表态。

此刻，新华社再一次发挥作用。根据有关部门安排，由我通过采访获取官方答复，我外交部再根据法方答复进行表态，以此成为历史“铁证”。

对我而言，这个采访显然不轻松，因为此时法国没有任何部门和任何人愿意出来讲话。在总理府新闻官的电话采访中我捕捉到机会。刚开始我打电话好说歹说他都拒绝表态，就在他要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我问道：“我只是向您求证，法新社的那条消息，您能否给予证实？”这位总理府发言人终于在我的录音电话中留下了我所要的几个字：“我证实。”“根据我提供的法国官方的表态，新华社发布了法国总理府发言人确认法国将不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新闻。”

（摘自《环球》第14期 沈孝泉 / 文）

1977 上书邓小平:中国作曲“梦之队”的命运转弯

“做老师最可惜的是，人才招不进来。看着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进不来，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着急？”曾经担任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附中校长的左因回忆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招生情况说。

原来，当年中央音乐学院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但是，这一届的招生名额却只有105人。特别是作曲系，考生人才济济，却仅仅只有10个人的名额。这些天才，注定会有人被挡在门外。但，他们遇到了“贵人”。

“老3楼”的圈子

邓启元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68届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铁路文工团。他和储望华是“哥们儿”。杨峻、潘一飞和储望华同为钢琴系青年教师，都住在音乐学院老3号楼宿舍，也便和邓启元混熟了，常聚在一起。杨峻的妻子、管弦系青年教师左因也常常参与，老3楼一楼的杨家便成了他们的据点。

左因人脉广，常热烈地说起听来的各系的招生盛况，其他人也纷纷兴奋地说起自己所知的情况。眼看着这些难得的、多少年才积攒下的音乐天才们没有机会入学，大家都替学校深感惋惜。他们太知道考生的不容易了。

上书邓小平

邓启元的叔叔邓力群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邓小平班子中的重要一员。邓启元经常去见叔叔。“我记得他当时主管文化、艺术、教育、科学这一块，所以我经常去他那儿向他汇报一些文艺界的情况。”邓启元



1977年的“上书信”原件，其上有邓小平的批示以及其他4位领导的圈阅。

说。有一次，邓启元向叔叔提及中央音乐学院招生藏龙卧虎名额极其有限的情况，邓力群听后非常激动。他让邓启元立即组织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写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向邓小平反映。

当晚，邓启元立刻找到储望华、杨峻、潘一飞商量此事。最后，大家确定了分工。左因负责收集各系材料，杨峻负责起草和执笔，潘一飞作改定。

起草大概花了三四天。这期间，邓启元几乎每天都要去向邓力群汇报进展，征询意见。当信完成时正是深夜。储望华手持信件，火速骑自行车送到邓启元的家中，邓启元接过信件后，就像传递火炬接力棒似的，随即又蹬上他的自行车，飞奔到他叔叔邓力群家。

两天后的12月11日，邓小平的批示下达：“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我们每个人都 very 激动，在潘一飞家里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邓启元笑着说。

77、78级神话

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原定录取105人，结果录取了213人。作曲系因为人才众多，由原定的10个名额，增加到36个。

最终，1977、78级作曲系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作曲家，如谭盾、叶小钢、郭文景、陈贻、瞿小松、陈其钢等，开创了音乐学院77、78级神话。（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杨敏 / 文）

那年